

的代表作，其寫作時間乃在崇禎十三年(1640)至十七年(1644)之間；同時，崇禎十三年至十六年(1643)，雲間三子亦曾合編《皇明詩選》，此集推尊前、後七子的詩作為明詩之「正經」，更表現出雲間三子繼承復古事業的強烈決心。據此，陳子龍後來減退復古文學創作熱情的說法，恐難成立。在陳子龍的觀念中，「復古文學」與「用世之志」其實並無衝突，二者反而應合為一體，如〈皇明詩選序〉所云：「二三子生於萬曆之季，而慨然志在刪述，追游、夏之業，約於正經，以維心術。豈曰能之？國家景運之隆，啓迪其意智耳。」¹ 詩歌之雅正既能維繫心術，並與國家之景運息息相關，則雲間諸子對於復古文學的追求，不正是用世之志的一種展現？另外，再如此書第六章曾賞析陳子龍與宋徵輿〈玉蝴蝶·美人〉的同題之作，作者云：「相形之下，宋徵輿詞雖然對女子的相思著墨更多，其中的相思之苦表達得也很深沈，然而卻流於普通，不及陳子龍詞神形俱備，形象豐滿。」(頁197)此一評論先讚美宋徵輿詞中的相思之情「表達得也很深沈」，之後又云「流於普通」，前後語意不相連貫，讀者實無法由此體會出宋徵輿詞作不如陳子龍的理由。陳子龍詩詞的整體造詣高於李雯、宋徵輿，此為文學史上的定論，自無疑義。但就單一作品而言，陳子龍之作卻未必篇篇優於李、宋二子，以此闕同題詞作而論，二者的高下即不明顯。作者在論析雲間三子的個別篇章時，或許不必過度拘守「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第一」(譚獻《復堂日記》)、宋徵輿詩文「精鍊不及子龍」(《四庫全書總目》)的既定觀念。

Snakes' Legs: Sequels, Continuations, Rewritings, and Chinese Fiction. Edited by Martin W. Hua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Pp. vii + 306.

高桂惠，政治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黃衛總(Martin W. Huang)以李漁對續書的說法「狗尾續貂」為書名出發，指出李漁見到了續書的第一次繁榮，並比較了劉廷璣認為續書不可能超越原小說的看法，黃衛總以《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的小說有百分之十三為續書，截至本書編纂為止，只有李忠昌的《古代小說續書漫話》針對這個現象做研究。因此，他認為續書研究有其重要性。其原因有三：一、不研究續書，對中國小說的理解就不完整。二、不能因為假定續書是一種模仿就將它排除在研究之外，因為

¹ 上海文獻叢書編輯委員會：《皇明詩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5。

文本的借用 (textual borrowing) 幾乎是中國白話小說的主要特色，續書只是在次等的層級上強調了這一點。三、研究中國小說創作過程中，續書是作者和讀者間複雜關係的肥沃土壤，因為續書作者經常意識到身為讀者和作者的雙重身分。

此書探討的續書範圍始於明末而終於清朝 (1644-1911)。主要問題有二：一、既然續書是一種「聲譽不佳」的文類 (genre)，為何續書作者依然持續寫作？二、續書讀者為什麼願意讀續書，即使他們明知拿續書和原作相比會失望？

接續以上兩個面向的討論，黃衛總處理了續書的定義。他首先引用林辰的看法，認為廣義的續書可以是為了使原作更好而延伸、摘要、重寫原作；狹義指引申、演繹原作的角色和情節發展。而李忠昌則認為續書發展了原作的敘事邏輯，亦即：續書必須和原作在結構上有所聯繫，在主題上一般來說能與原作的情節有聯結，如首尾相銜，因果相應等。此外，Paul Budra 和 Betty A. Schellenberg 則認為續書是故事的年序延伸 (chronological extension of a narrative)，它本身是封閉和完整的。Gerard Génette 也強調續書的封閉性 (closure)，書的「繼續」 (continuation) 是「完成」 (completion)，而續書則是「延長」 (prolongation)。

透過以上多種定義及不同見解，黃衛總以比較寬泛的角度界定續書：「接續的故事」 (ensuing narratives)。因此，這部選集收錄了不同層次的續書研究：第一部分是經典續書，第二部分則為一般不認為是續書，但可放入林辰所定義的廣義續書，使我們重思續書的本質的小說；第三部分則是晚清續書，由於西風東漸，這類續書也在「新編」、「擬舊」等技巧上改變了續書的風貌。全書選錄十篇文章，簡介如下：

第一章論及續書的概念在中國比西方更廣，接下來談十七世紀中期續書的興起和同時出現關於續書的論述；而另一個續書的重要時刻乃在一七九一年《紅樓夢》出版之後，許多《紅樓夢》續書都有所謂的「續書焦慮」 (xushu anxiety)，其焦慮是兩方面的，其一為對於其他《紅樓夢》續書有高度的讀者自覺，其二則是要和續書「畫蛇添足」的印象抵抗，努力做出回應或突破。

第二章由 Li Qiancheng 探討《西遊記》的三本續書：《續西遊記》、《後西遊記》與《西遊補》。作者指出，如果《西遊記》是心的旅程，那麼這三本續書都繼續且重覆了這個旅程，它們也都經歷了「往內在轉變」的過程，更著重於人心的內在運作，而在《西遊補》達到「最內在的終點」 (innermost destination)，這個內在旅程和晚明心學主宰知識分子的視野有關。

第三章則由胡曉真探討《續金瓶梅》一書。著重指出丁耀亢認為自己在「正

確地」解讀《金瓶梅》，要傳遞的是過度縱欲使明滅亡，並且在放入對明朝的懷舊及忠誠的同時，也承認歷史循環的無可避免，利用因果報應來合理化朝代的變遷。此外，丁氏也認為他的成書是對《太上感應篇》最正確的詮釋。

接下來的第四章由馬克夢 (Keith McMahon) 從三個領域談《紅樓夢》續書。第一、續書如何使寶玉「更好」，如：更健康、更符合社會對貴族男性的期待；第二、為黛玉辯護；第三、提供寶黛之間愛情的解決之道。這些續書都將原作的複雜性簡單化，但是續書解決原作難以處理之部分的具原創性的企圖，和續書堅持將女性放在一夫多妻制上來看，或以直接和實用的解決辦法來解決獨立於成人指導之外的年輕愛情，都是值得注意的。

在第五章中，Ellen Widmer 從《紅樓夢》續書談到女性讀者與中國傳統小說的關係，續書把目標放在數量更多、但是接受較少教育的女性讀者身上。如：《紅樓夢影》就證明了《紅樓夢》有廣大女性讀者，作者更斷言最早由女性創作的古典小說就是《紅樓夢影》，其原因在於寫作續書比起自己原創一部小說，可使女性寫作這件事不致於顯得太放肆，《紅樓夢》在閱讀和寫作的領域上對女性都是適當的 (appropriate)。Widmer 還把《紅樓夢》續書和當時的彈詞連起來看，以對女性在十九世紀直接參與中國通俗小說的發展獲得更完整的圖象。

至第六章，Yang Shuhui 論述《水滸傳》的續書，指出其數量僅次於《紅樓夢》。俞萬春寫作《蕩寇志》試圖說明這些反抗者最後如何被處死，此書實際上接續的是金聖嘆的七十回《水滸》。《水滸傳》成功地揭示了政府的腐敗和無能，因此對俞氏來說，梁山泊的好漢被官兵降服並處死便成爲一個很難處理的部分；俞氏遂設計了陳希真這類人物，因爲政府的腐敗而武裝起來，結果陳希真還是成爲了類似梁山泊好漢的角色，而這樣的角色是俞氏一開始便想要駁斥的。因此，儘管俞萬春宣布要拋棄原作的意識形態卻又不免陷於原作的邏輯之中。Yang Shuhui 最後評論：俞萬春《蕩寇志》想要重寫全部的《水滸傳》，並試圖呈現一個人在被處決時，如何能夠不反叛，但是卻失敗了。

第七章由何谷理 (Robert Hegel) 談論跨文本的關係 (transtextual relationships)。《說唐全傳》重寫了它的「祖先」(例如《隋唐演義》) 的一些重要角色，藉由轉變這些相對「寫實」的人物，使之成爲遠非生命舞臺類型，兼具可笑和娛樂性的角色 (159 頁)，來諧擬具崇高文學價值的小說。《說唐》在《隋唐演義》中創造了一種另類的歷史閱讀，它本身就引起了很多續書，如《說唐後傳》。Hegel 認爲《說唐全傳》是由文學作家創作的作品，而不是由說書人稿本集合而成的作品。

第八章談到清朝《如意君傳》的作者陳天池常常要他的讀者心中有明朝的《如意君傳》。Laura Wu 認為陳天池從道德批判的角度進行書寫，正確地重寫了明朝《如意君傳》。明朝本的《如意君傳》以女性為主角，陳天池的故事則是「男性重新獲得權力，父權重新恢復」（199-200 頁）。何谷理和 Wu 認為《說唐全傳》和《如意君傳》是續書，因為它們都是以續書的形式對原作做批判的閱讀。它們可以被視為重寫，必須要讀者喚起對原作的回憶。在此，讀者的訓練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說唐全傳》之前的《隋唐演義》本身大部分就是根據《隋煬帝豔史》和袁于令的《隋史逸聞》而來，因此它是「原創」加「續書」。《隋煬帝豔史》本身又是《隋史逸聞》的來源，而《隋煬帝豔史》則是由《混唐後傳》而來，《混唐後傳》之名又顯示它可能是某書之續書，因此《隋唐演義》基本上是三部小說的重寫。從《混唐後傳》到《說唐全傳》就是一個「續書」的過程，重寫 (rewrite) 和續集 (sequel) 兩者常常在這過程中無法分辨。由此可見，中國小說有一個傾向，就是在「續集」出現之前，常常就已有「重寫」的現象了。也就是說，一開始續書是以重寫的形式出現，在重寫之後又接著有了續集，「重寫」和「續集」這兩種續書的形式常常不易分辨清楚。

第九章論及晚清續書的兩種重要形式：「擬舊小說」和「翻新小說」。藉由「時代錯誤」、「錯置」和「滑稽模仿」等手法，寫作者表達他們對快速轉變的當代社會的想法。Ying Wang 在第九章討論的兩本《新鏡花緣》都可稱為「翻新小說」。蕭然鬱生的版本是希望透過《新鏡花緣》中的改革運動，發洩他的失望。《新鏡花緣》延續了《鏡花緣》以旅程為主題 (motif)，同時也是譴責小說。而陳嘯廬的《新鏡花緣》和華琴珊的《續鏡花緣》則堪稱是已在《鏡花緣》中出現之女性議題的晚清「再度發聲」(revoice)。陳主張「適度的女性觀點」(moderate feminist views)，而華則為成長中的女性運動感到驚駭。Wang 認為這樣的分歧是因為原作的的不確定性和原作冀求重讀 (rereading) 和重寫的自我意識傾向。

第十章探討的是劉鶚對他自己的《老殘遊記》所做的續書。續書一般都是「由他人寫的」(allographic)，但這一本則是「作者自撰的」(autographic)。在晚清之前，唯一由作者自己撰寫的續書是方汝浩的《禪真後史》，亦即《禪真逸史》的續書。作者自著的續書在進入二十世紀後已經很普遍，續書的「自傳體傾向」(autobiographical tendency) 係以從「自我辯證」(self-vindication) 到「自我慶祝」(self-celebration) 的歷程來呈現。續書強迫讀者從一個新的、更為自傳的角度去重讀原作。劉鶚的續書是經過單一作者 (single author) 認可和合法化的續書，它使得

原作比其他的續書原作更具自傳性質。

進入民國之後，盜版書盛行，如：張恨水的《啼笑姻緣》出版後就有十幾種非經授權的續書出現，甚至有人冒張恨水之名寫小說。這是張恨水為什麼自己寫續書的一個原因，就是要證明他自己才是唯一合法能寫真正續書的作者。有人認為張恨水在續書中把許多角色寫死，是爲了要杜絕續書的產生。在此，寫續書成爲證明作者爲原作之擁有者的方法。二十世紀前半，續書的寫作僅限於舊派小說家，如張恨水。五四作家不寫續書，如巴金在寫續集時，他不用續書這一名稱，而用「三部曲」的名稱，強調所有的創作都是原創，而不是利用原作的成功來獲取利益，寫續書已經變成舊派小說家爲了錢出賣靈魂之事，五四作家不願被定義成這類作家。續書的寫作到今天仍在持續，但是它們被認爲是「科學地」重構原作遺失的部分，所以說文學詮釋現在很明顯地呈現爲續書，文學詮釋和續書已經無法判然分辨了。

大體而言，本書所集論文堪稱一時之選，不論研究者之視野、問題意識、文化闡釋以及對小說傳統、文本流變、影響的考掘，往往深具啓發性。相對於近日續書的研究成果逐漸豐碩，如：王旭川著《中國小說續書研究》¹、趙建忠著《紅樓夢續書研究》²等書，這類專著或是以類型，或是以方法論，或是以價值評量看待續書現象與小說史、小說傳統的關係，比較習慣將小說續書置於「先鋒」、「高峰」或是「完整性」的歷史之鏈中予以闡析。與之相較，這本選集的呈現毋寧是傾向貼近續書創作情境中那斷片性的、拆解式的、邊緣的、也可能是游擊式的，總之，可能不那麼偉大的創作狀況，正因爲如此，似乎也更吻合續書的歷史存在。

但是我們在這些歷史斷片當中仍能透視若干群體效應或者是更爲游離的現象：由於此書各章的研究對續書定義的關懷各異，因此針對問題的提出與開展有時就顯得比較側重在某些特定面向，相對的忽視各續書不同創作狀態下的個別特色。如第二章：Li Qiancheng 探討《西遊記》的三本續書均以哲學和文學之心之「內在變化」(inward turn) 進行集體論述。然而我們卻在《後西遊記》的裝僧與扮儒的書寫策略中發現這部續書透過一連串的漫畫畫卷與語言機鋒，來對「西遊」系列中唐僧故事與《西遊記》原著正典化的另一種消費與消解，所謂「(天花)才子」意見，顯示出與其他續書對「心」或「內化」問題的關注有相當距離，反倒

¹ 上海：學林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五月一版。

²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九月一版。

是對僧團、儒林之集體現象的嘲諷與批判等「外部」問題的提出特別引人注意。

又如第六章中，Yang Shuhui 討論俞萬春《蕩寇志》的續書策略，看來仍以金批《水滸》「從作家出發」的觀點切入，而不是「從文本出發」的深刻回應，因此所謂「《水滸》邏輯」仍是「金聖嘆邏輯」。其實《蕩寇志》選擇《水滸傳》「三打祝家莊」作為「復仇」意志之展現，正是在「灰色地帶」尋找轉化的契機，「家族」成為「國族」與「民族」結合的精神紐帶。對「莊園」模式的再利用，一方面回歸宋江「權力」來源的「《水滸》邏輯」的記憶，以質疑其領導地位；一方面再次發動民間新興的莊園力量作為整編的自發性想像，以取代陳麗卿遭調戲式的原「《水滸》邏輯」的「官逼民反」，使得「蕩寇」之舉具有「家族」意涵，「家族化」話語控制與演出實際上比「國族想像」更具體可見。不只《水滸》續書有這個現象，「家國互喻」這類書寫遍及《紅樓》續書、《金瓶梅》續書以及《說唐》系列和家將類小說等各類小說及其續書。因此，本書各篇文章實際牽涉續書文化所牽動的明清中國有關國／社群／家／自我等層級的整合與回應，如果能予以分疏，說不定又是另一番文化景觀。

以上兩點觀察，前者的問題在於將《西遊記》續書視為「猴的內在變化」的一個整體，以致忽略《後西遊記》似乎並不是「內化」的問題，反而比較接近譴責、黑幕小說的「揭露」美學，是對「外部」社會的關注多於「內化」的省視；而後者在論述「《水滸》邏輯」的成敗時，對《水滸》續書的考察傾向於針對俞萬春《蕩寇志》的單一續書之上，以致於對明清士人在「《水滸》邏輯」的意識形態接受史的理解反而未能脫離「金聖嘆神話」。當然，作為不同研究者心血所匯聚的總集，採取單點或脈絡化面向的測繪和闡釋是比較難以統一的，基本上這部選集的論文都是徵引宏富，選題、立論多有創新之處，取得集大成式的成果。

這篇評介與其說是評論，不如名之為濃縮的譯介，對我而言，在歷經一大段踽踽獨行的續書研究生涯，欣見一群志同道合的學友，限於篇幅，與身為讀者的蔽障，如此的回應是明顯不足與不敬的，事實上，此書每一篇文章幾乎都在相關領域裏帶來突破的效力與創發，不僅值得一讀，更牽引出許多「描跡元素」(tracer element)，以待來者循著續書研究的蹤跡繼續探索。